

美国著名文化社会学家Jeffery Alexander 教授访谈录

曹晋 姚建华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被访者简介]杰夫瑞·亚历山大 (Jeffery Alexander) 教授, 1947年生,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莉莲·沙旺森·萨登教授, 文化社会学中心发起人、主任。享誉世界的著名文化社会学家, 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他于1969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 197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主任, 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委员会、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事过研究工作, 并曾任教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及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最近他还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获得荣誉职位。亚历山大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文化和政治。其主要著作有: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1982-1983, 共4卷)、《社会生活的意义: 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2003)、《公民领域》(2006)、《表演与权力》(2011)、《牛津文化社会学手册》(2012, 合编)、《创伤: 一种社会理论》(2012)、《现代性的阴暗面》(2013)、《奥巴马政权》(2014)。他的论文《论道德普遍性的社会建构: 从大规模杀戮到精神创伤的大屠杀》(2002)是《纪念大屠杀: 一个争论》(2009)一书的主题文章, 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一、(采访者)问: 您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新闻业危机再思考: 文化的权力”主题所进行的演讲, 体现出您和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不同的思考, 政经取向的学者对市场壁垒和技术高墙导致的市场垄断、民主匮乏的当下情境深表忧虑。您一以贯之的主张, 文化不是部分社会学家体察社会的一个非独立变量, 文化社会学 (Cultural Sociology) 中的文化则在型塑人的行为和建构制度时, 有其自主和相对独立性, 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如物质、制度力量一样的活力。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利润和效益为最高道德律令, 市场经济还将持续深化, 文化也面临其渗透, 文化还很容易被经济驱使, 参与消费主义的动员, 那您认为文化的独立性在此语境中如何体现?

(Jeffery Alexander) 答: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市场垄断问题。在我看来, 市场只是不同社会体系中的一个维度, 而且市场的影响是变化的——因其他制度影响力的不同而不同, 这也是我和马克思观点的殊异所在。市场以外的其他领域也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现在的问题是: 资本主义中会存在民主吗? 也就是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否相对独立, 政府对“公民领域”中的问题是否可以进行快速地应对 (哈贝马斯用“公共领域”来指代)? “公民领域”是否可以独立于市场? 从本质上而言, 市场是反民主的 (anti-democratic) ——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不同意下面的观点: 市场决定并赋权社会中的其他的一切。在我看来, 很显然, 社会的不同子系统都有支配他者的可能性, 举例来说: 在一个集权制的国家, 政府占绝对的支配地位, 包括宰制市场, 市场屈从于政府; 在一个神权的国家, 如伊朗, 宗教领域会支配社会的其他方面, 包括市场和国家。甚至种族也可以成为一个决定社会的要素, 如过去的南非。在我看来, 事实上, 新闻传播有潜力且总是相对独立, 相对于国家和市场而言, 其具有一定的权力, 宗教也是如此。我的著

[采访者] 曹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者
姚建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博士

作旨在指出新闻传播是一个平行的组织结构（an horizontal organization），且是自我规范的（self-regulating），它们有自己的职业标准和规范，规定合格新闻工作者的必备要素——培育新闻工作者的学校、新闻工作的意义、对于新闻工作的迷思、新闻传播独立的历史、新闻传播的“无冕之王”。我认为，在新闻传播独立的且丰富的历史中，与市场和国家的关系都具有操演性，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也不逊色。在美国，市场和新闻传播之间具有宰制和被宰制的关系。有时候，市场凌驾于新闻传播之上，进而使得新闻传播不断丧失其“阐释性的权力”（interpretative power）。这一现象经常发生，不仅仅在美国，而且发生在很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默多克就会对新闻记者所写的内容进行裁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个例子来自于《泰晤士报》（这也是默多克控制的新闻集团旗下的子报），其品质不断下降，主要是因为它要不断迎合默多克自身的利益。但这并不是市场和新闻传播之间必需的关系。

在美国，许多报纸都坚持自身“阐释性的权力”，只要这些报纸的所有者可以成功地销售其报纸，他们更愿意也允许记者相对的独立性。如《纽约时报》给其所有者索尔茨伯格家族带来的利润率大概在5%左右，但是同时其给家族成员带来了荣誉和社会地位。索尔茨伯格家族会保持报纸的现状，相对来说，《纽约时报》是一份具有相对批判性的报纸。

事实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媒介社会学家Michael Schudson 教授（也是报纸方面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和在我的著作中都论述过，市场可以是在推进报纸独立性方面的积极正面的力量，尤其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初期。报纸的独立性使报纸本身得以维系：报纸首先是个人经营的，被用于个人的政治目的和表达，或被宗教团体、政党所有一一这就意味着报纸和狭隘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紧密相连。而报纸的市场化推进了报纸渐渐地独立于社会的其他力量，如果它们得到广告商的支持，那么它们就可以维系其基本的日常运营。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报纸的独立性受到了挑战，因为报纸不再这么容易获得广告商和资金来源。

关于市场方面，我想论述的是所有权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所有权形式是由大型的上市跨国企业所有，另外一种则是家族所有。我觉得报纸最好由家族所有并进行经营管理。举例来说《洛杉矶时报》（钱德勒家族），《芝加哥论坛报》（麦考密克家族）、《华盛顿邮报》（格雷姆家族）、《纽约时报》（索尔茨伯格家族，1885年获得该报的所有权）。如果富裕的家族对报纸拥有所有权的话，因其家族的社会荣誉和地位来自于报纸的质量，所以他们会确保报纸的独立性，且并不刻意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本身就是社会上的殷实阶层，不需要仰赖报业盈利来为家族富裕打基础。但是当报纸成为了大型公司的一部分，情况就非常危险，犹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许多报纸纷纷被大型上市公司收购。对于这些报纸而言，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其理所当然的诉求，有时候它们要求的利润率达到了10%甚至是15%，而不是3%-5%。在这种经济压力下，报纸不得不降低其质量和独立性，如控制《洛杉矶时报》150年的钱德勒家族将其所有权卖给论坛报公司（其也是《芝加哥论坛报》的所有者）——因为论坛报公司是上市企业，因此两份报纸的质量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纽约时报》因为索尔茨伯格家族的所有，一直坚持着其独立性和高品质。

市场是一个较大的范畴，在这个大范畴下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情况或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我的重要观点，公司的所有权如何，市场和新闻专业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时候市场保护新闻独立性，有时候削弱新闻独立性）。在过去的一些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如亚马逊的所有者Jeff Bezos。大约在三年前，他从《华盛顿邮报》家族手中购买获得《华盛顿邮报》的所有权，并没有将邮报上市——因为对于他而言，出版报纸只是一种兴趣爱好，并不想从中赚钱。我觉得这是好的——不管怎么说，报纸乃至媒体总有其所有者（因为需要维持其基本的日常运营），政府也好，市场也罢，宗教组织，少数族裔抑或是个人都可能成为媒体的所有者。问题是哪种方式对于媒体独立性的侵蚀最小？

不同所有权情况下，自主性的形式多种多样。政府可以对于报纸具有所有权，或者是电台、电视台，但是政府可以同样允许新闻的自主性，如BBC（英国广播公司），它是世界范围内最重

要的新闻媒体之一，但其所有权归属政府，它在编辑的决定和所有权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这种平衡至关重要。在中国，大多数的媒体（尤其是线下的媒体都是国家所有），关键问题是国家所有权制度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编辑的决定和制作方的想法，是否存在着协调和平衡的机制？

资本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以及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大部分报纸都是由工业化时期的资本家或家族所有，都是在19世纪后期（1860年代、1870年代），大量的工业资本家或家族购买了这些报纸的所有权。现在我们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时期，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产生的百万富翁正在取代工业化时期的家族，如上文的Bezos就是后工业时期的资本家，他购买了《华盛顿邮报》。

在未来20年或者30年间会出现什么情况？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贵们都将和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计算机革命）紧密相连——他们或者购买现有的报纸，或者开办新的网络报社。报纸本身已经进入了后印刷数字化时代，将会持续保持其独立性。

从在20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大量的地方性报社被大型跨国企业取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报业连锁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形式（这种报业连锁往往涵盖了80家乃至100家不同的报社），纷纷上市，但我认为报纸不应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媒体的独立性以及媒体专业化的自我规范。我相信，在世界范围内，新闻传播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文化形式。事实上，新闻传播是具有普适性的一种现代化的机制。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新闻传播的独立性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得到支持或者反对。在美国，新闻传播独立性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市场，而并不来自于国家。而在中国，国家可能更多地影响新闻传播的独立性，而市场可能具有促进新闻传播获得自主性的积极和正面的力量。对于线上媒体而言，它们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如点击鼠标，点赞对于在线出版都会创造利润。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国家将私人领域还给个人，而不是像在先前的毛泽东时期那样，国家对于个人的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包括对于私人领域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市场的力量不能得到释放的原因。在过去的25年间，政府意识到构建“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对于其私人领域控制的重要性，如个人的爱情、友情、消费、资产、时尚、观点（只要不将这些观点进行政治性的组织和动员）等。这些都为在线媒体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如在线的报纸可能不会过多地关注政治观点，但是它可以涉及到个人生活中许多其他重要的方面，并以自由地进行表达，如体育、娱乐、争论观点等等。

二、问：我曾经领衔翻译了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前系主任Vincent Mosco和McKercher Catherine联合主编的*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此书收集的论文汇集了新近知识劳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语境中的劳动分析，分别讨论了全球计算机动画、电影、图书馆、报纸等产业的知识劳工的劳动如何被商品化，这是国际学界关于传播从业者劳动与媒介产业商业化关联的批判前沿研究，其间也透视出媒体产业的问题重重，您却主张洞察新闻业危机的正面力量，把新闻业视为公民机构，那些抵制媒体产业裁员或者企业剥夺的新闻记者作为行动主义者，反击新自由主义经济，积极开创公民空间，这是您强调的文化的力量吗？您认为新闻业的相对自主和独立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抗衡媒体的彻底商品化？

答：在我看来，商品化对于信息劳工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之前，记者（新闻工作者）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他们有着“特权”性的地位并掌握着一定的资源；但是在转型之后，随着保护性制度的丧失，他们不断经历着劳动力商品化的阵痛，并且沦落为“新闻民工”。

商品化的分析并不是对劳动性质一种精细化的分析，同时商品化的分析也并非探究强迫他人做事动因满意的回答，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用另外的话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工人都是商品。记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以获得报酬，不管是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其他职业的工作者也是如此：包括医生、律师。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劳工都是贫穷的，并对他们的劳动丧失控制权。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自我发展的职业化，以及成为一种技能的可能性。举例来说，医生可以

出卖其劳动力，但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医生可能需要接受6到8年专业化的训练——社会允许个人在出售其劳动力之前对自身进行培训和发展技能，提高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新闻传播的专业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商品化。什么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将被不断地减弱，直到降低到维持他们再生产的最小值——因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劳动力的价值变得异常低。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的分析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下降，反而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不仅仅对于工厂工人，而且对于社会需要的许多其他种类的工人亦是如此。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可以说专业化“抵制”商品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商品化”和“独立的文化力量”紧密相连。比如艺术是一种商品，但是艺术并不是资本家创造的，而是由艺术家创造的。这些艺术家的生活可能是独立的，而他们的艺术品进入市场，并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体育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运动员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我相信新闻传播也是一样，因为新闻工作者有他们自己的传统，他们自己的学校、他们自己的培训，所以提高了他们生产产品的价值——一种非常特殊的产品。为了更好地保持新闻传播产品的价值，新闻工作者需要更多的独立性。如果对于新闻工作者进行诸多地限制，那么他们生产出产品的价值也将被不断削减——很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一种粗糙的、质量低俗的、不受好评、且价值很低的商品。《纽约时报》、《卫报》、《华尔街时报》正是因为其独立性和其所具备的专业性，而颇具价值。

新闻工作者在美国从来并不是知识分子。在中国或者在法国，可能重要的记者是知识分子。在美国，记者的社会地位略低于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的中产阶级，和律师地位相仿。记者如何维持其相对的独立性？他们如何应对商品化？可能存在着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当工人阶级受到来自资本或所有者攻击的时候，记者进行公开地抵制：他们写文章、他们组织工会、职业协会（在公共领域有一定的发声权）。除此之外，当记者深陷囹圄的时候，公共领域的其他组成部分（除了记者以外）也为记者代言。当面对商品化冲击的时候，记者可以得到很多帮助，有时候这些帮助可能来自于政府（大部分的情况下，政府承诺帮助记者应对商业化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很多富人也声称，他们将购买报社，并将报纸交由记者打理。

这里的理论问题是，在记者和商业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当商业对记者产生威胁的时候，记者是否可以向“公共领域”进行利益的诉求。事实上，在美国这种“公共领域”是存在的，并帮助在记者和商业之间建立一些“障碍”，防止商业对于记者进行无限制的利益侵害，如在对商业化研究的案例中，《新奥尔良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何评价大量的新闻工作者失业的问题？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动力的体系——人们总是面对着失业的危险。在从传统纸媒向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25%的记者被解雇。这是令人感到恐怖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核心问题是另外75%的记者是否可以继续工作，他们的收入是否会变少。我们如何评价crowd-sourcing（众包）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影响？“众包”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众包”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找寻大量的信息。但是在我看来，大量的信息是保密的，并不能由大众发现——只有新闻工作者（记者）可以对其进行调查。新闻工作者本身也会使用“众包”，这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众包”模式不会替代新闻工作者。

消费者导向的资本主义和“众包”紧密相连。在1920年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消费者做出最后的决定，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决定进行生产。当前的中国正在慢慢地进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改变。就新闻工作而言，还是需要由专业人员来对大众发现的内容进行整理，写故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众包”不会替代新闻工作者。

三、问：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和普及，与信息资本主义扩张密切构连，Marcuse 在其《单向度的人》论著中敏锐体察到“技术的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的理性”，哈贝马斯主张技术意识形态已经替代先前的意识形态，文化在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下，又是如何相对自主？

答：我们现在所在的社会并不是单向度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访谈的主线。就像我在访谈一

开始所说的，资本支配着社会中其他组成部分，多元主义和多元化具有存在的可能性。我用多维度的社会（multiple dimensional society）来概括我们当下社会的特征。我不同意Marcuse所谓的“单向度的社会”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他们的论点更多的是一种警告，而非是对当下社会的客观描述。法兰克福学派警示人们要提防技术理性，希望人们能够追求多种维度。在哈贝马斯看来，不仅仅存在技术理性，还有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规范理性（normative rationality）以及阐释的自主性（interpretative autonomy）等等。

对技术理性化的假设是错误的，如此设想，并不能导致技术成为善意的力量服务社会，技术对现代生活的巨大危险不在于技术奴役、操纵了政治、经济或者文化，而是技术被想象、预设为救赎或者高科技具有种种迷思，这才是技术的危险与人类现实的灾难。所以，对技术的肯定性思考和否定性反思都应并存。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事实上不仅仅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还存在着很多其他的理性。我们都畏惧被商品化，害怕被工具化，我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我们有独立的价值、独立的文化追求。商品化对于每个人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商品化可能带来的实际效果和预设的却截然相反：举例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一方面，工人阶级被商品化不可否认；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组成工会、组织工会活动，最终组织社会运动用来抵制商品化的进程。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给政府施压，通过法令确保工作的时间减少（明确规定八小时的工作时间）、在工厂中引入安全标准和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反商品化”的。在我看来，资本的逻辑受到其他领域逻辑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的历史。

四、问：我的团队几年来持续以民族志的研究路径扎根上海的部分家庭或者网吧，观察都市学龄前儿童和青年如何玩游戏，作为批判的传播学者，我所担忧的是新媒介技术对儿童具有极大吸引力，儿童“玩工”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儿童，“技术异化的低龄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游戏产业已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支柱，电子竞技已经被国家体育总局指定为体育运动项目，这就是国家赋予技术和市场的正当性，“电竞玩家”对青年人具有相当吸引力，那是能够一夜暴富的青春饭碗，过去，我们还警醒全社会游戏是青少年成长的毒品，今天，游戏的社会意义已经改变，成为经济增长的产业，您如何思考这些问题？

答：这是和童年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就像我在上一个问题中强调的那样，商品化一定存在着反推力——资本主义的历史，不是“商品化”的历史，而是“反商品化”的历史。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于孩童的保护，防止他们成为劳动力商品。在1850年代，童工（差不多8-10岁左右）是被允许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在20世纪通过了废除童工的立法，孩子不能强制在工厂上班。政府为孩子提供了学校，并资助这些学校，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反商品化”运动，因为1850年代到1920年代，这是保护家庭的重要举措，也是保护孩子的重要措施。

这些努力从未终止过。在商品化和家庭价值之间总是存在着张力。举例来说，在美国有饮料和糖果公司，它们在校园内兜售可乐和糖果。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不健康的——家长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动员起来，将这些公司排除在学校之外。这仅仅是诸多抗争中的一例。

就游戏而言，其本质也是一直以来在市场和孩子（或家庭）之间寻求平衡。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电子游戏对于孩子在经验层面上的影响。不可否认，游戏对于孩子的影响和商品化紧密相连。但是我相信，如果存在着“公共领域”，那么就会对孩子玩游戏这个问题通过法令进行规定：如孩子不能自行购买游戏（规定购买游戏的年龄）、孩子不能上网等。但这个问题仅仅靠政府是不能解决的，还需要靠父母，如孩子在父母的监督下才能够上网。商业（企业）或政府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关键问题是必须存在并维护“公共领域”对于商业（企业）进行管制。

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其实是其权力的体现。资本主义或现代社会总是不断变化，孩子可能具有家长所没有的观点和想法。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家长来说区别什么是应该控制和什么是不应

该控制的，变得异常困难——有时候，孩子在某些方面要比父母了解得多，如对于社会媒体的使用，对于电脑的使用。对于年轻人哪些行为和实践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成年人对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家长会允许孩子的一些行为的存在，即使他们不喜欢这些行为。

游戏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不仅仅在资本主义中存在着文化的问题。科技有着自己的迷思（myth），其不断被神化。资本主义乃至整个现代化都崇拜科技，认为科技就是上帝，它可以解决人们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拯救人类。我觉得这令人感到沮丧，但是同时促进了不同发明的出现。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代替去教堂，人们发明了很多的机器：蒸汽机、电报、收音机、电视、网络、电脑。我们通过新的科技形式解决现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由先前（可能是三十年前）科技所造成的。比如我们现在在处理雾霾，而环境的恶化是由人类在过去百年来的发明所造成的——而这些科技可能在帮助人类摆脱贫困和其他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就先前在校内兜售饮料和糖果的问题而言，我们不能仅仅斥责企业或公司（它们生产了大量的垃圾食品，如薯片），家长也应该对孩子的肥胖问题负责，因为家长允许孩子们吃这些食品。这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政府是否需要规制企业不能从事薯片的生产？同样的问题也涉及到吸烟。烟也是文化商品化的组成部分。制烟业也是美国一个异常庞大的产业。旨在提倡健康生活的社会运动慢慢开始对吸烟进行抵制，尤其是对于将烟商品化进行限制：如广告商可以在哪里投放烟的广告，烟可以销售给多大年纪的人群。政府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对于商业进行限制（参见Richard Klein在*Cigarettes are Sublime*一书中的观点）。

意义的生产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意义的生产并不仅仅由市场所决定，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我们来重新审视吸烟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不可否认从事香烟制造的企业异常富有，他们投放广告，他们控制着大众；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解释反对吸烟的社会运动呢？这些社会运动在“公共领域”中兴起。吸烟所隐含的“男性化气质”的意义生产怎么样被当前“健康”的意义生产所替代。当下这些意义的生产对于制烟企业的影响又如何进行评估？意义的生产相对于市场而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回到游戏的问题，如果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置身于此项研究中去，他们将要或正在改变游戏的意义——学者在“公共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

在任何的时间，企业或者商业的力量总是非常强大的。但是我们始终需要牢记：商业依赖于消费者。所以有些企业非常有责任心，如绿色企业。绿色企业的成长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它们现在得到广泛的认可。富士康企业在西方声誉也不佳，因为其对于劳动力的剥削登峰造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些许的变化——但是对这一点我并不笃信（NGO在这方面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NGO应该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将如何影响，它们是否需要通过媒介的某种形式和大众联系起来？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五、问：能否请您简单勾勒文化社会学的最新进展？从事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具备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新闻传播学也不例外，当下美国社会学的量化取向，学生在数据统计分析方面得到比较多的训练，能够捕捉社会事实的状态，但这一路径缺少社会历史脉络的熏陶，并不能对变动中的社会情境有透彻的理论阐释。从我自己的批判传播研究来说，要明晰探索且揭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如何建构了特定的媒介生产，深刻认识被藏匿的历史起源和迷思在政治社会中的功用，必须要求学生积累人文学养，从而弥补量化研究所无法进行的相关联意义的洞察。因此，即使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深厚的人文素养，请您谈谈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您如何培养文化社会学的研究生？

答：文化社会学的兴起和我们上述讨论的问题不无联系。文化社会学既是一个学科，也是一种理解意义生产的方法和理论，与其他方法或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独立性。与研究国家的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一样，我们同样需要关注文化社会学。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和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在概念性定义，如价值、符码和话语的面向基本一致，两种传统都将文化看作社会的一项重要议题，为社会学研究起到补充的作用。但

在结构的层面上，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是将文化视为自主性的独立变量，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犹如物质、制度力量般的勃勃生机，并非软性的依附性变量，我一再主张以“强文化范式”贯穿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这一将文化与社会结构脱钩的尖锐争论，就是要阐明文化在塑造社会生活方面的强势力量。文化社会学关注通过与先前传统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对社会的不同维度进行研究。比如有文化社会学家对于工人阶级意义的生产进行研究，Michelle Lamont对于社会的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分别有一本研究著作，她使用了working man这个术语，并延用了涂尔干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工人阶级是如何理解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还有文化社会学家对于战争的研究，对于种族冲突的研究、以及对于犯罪、全球变暖的研究，如Philip Smith（就职于耶鲁大学）研究为什么全球变暖作为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没有被美国社会接受，是因为其中并没有涉及到科学，还是因为其在文化过程中（cultural process）没有涉及到公众的戏剧性（public drama）。他的研究结论是很难对于全球变暖问题进行戏剧化的处理，而人们只是强调其中的知识，缺乏对文化戏剧性（cultural dramatization）的演绎。而我本人对于奥巴马的政治有所研究（两本著作）——政治在当代社会是理性的选择，但是更多的是社会表演（social performance）。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传统）都承认政治是理性的，并且讨论用科学的方法讨论我们社会中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政治带有戏剧性色彩。

在美国的社会学中，ASA（美国社会学学会）非常重要。1980年后，美国社会学学会才有了文化分会（美国社会学学会由很多分会组成，如媒体、政治、经济等）。但是就在10年前，文化分会成为了美国社会学学会最受欢迎，也是最核心的分会。

在文化社会学中，重要的学者有：

哈佛大学的Michelle Lamont（文化社会学者），她聚焦种族和族裔的不平等，在知识和高等教育社会学领域颇有研究；普林斯顿大学的Paul DiMaggio，他更多地从Bourdieu（布尔迪厄）的研究路径来研究文化社会学，主要研究博物馆、计算机、艺术；普林斯顿大学Viviana Zelizer，她主要从事经济文化社会学，主要聚焦于经济的文化和道德含义；耶鲁大学Frederick F. Wherry，经济文化社会学者，他主要研究移民和少数族裔如何更为公平整合到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之中；耶鲁大学Philip Smith，文化社会学者，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并关注政治社会学和社会运动；西北大学的Wendy Griswold；文化社会学者，关注艺术和宗教社会学，以及对于文学的社会学路径研究；加州伯克利大学的Ann Swidler；研究文化和机构之间的互动性，尤其是人类如何使用文化同时文化塑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

在文化社会学中，有很多充满分歧的观点，如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马克思色彩的文化研究，用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文化问题的代表人物有汤普森（E. P. Thompson）（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治方法对于工人阶级进行研究）。阶级是一个因变量。我们如何对于阶级进行分析，这涉及到许多文化因素的解读——如在对社会较低层次的阶级进行的过程中，民俗文化（folk culture）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

目前很多学生接受了长期的定量化训练而缺乏定性化研究方法的训练，应该怎么办？文化社会学的学生应该具有人文学科的知识基础。但是我也要为美国社会学学会辩护：今天，美国社会学也不是完全都是定量化研究（统计社会学、定量社会学在1980年代达到顶峰），在过去的30年间，质化研究又成为了流行的研究的方法。因此，除了文化社会学以外，还存在着比较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等等。与此同时，民族志的研究是美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也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如他们对于贫困的研究、对于非洲裔的美国人的研究、西班牙裔的美国人的研究等等。

在耶鲁大学，就博士研究生的教育而言，一般都是6年制（第一年和第二年必修课程、第三年博士中期考核、第四年开始进行论文的写作）。研究生的教育强调理论的学习，因为对于经典文献的学习是研究的基础。和论文相比，对于现在求职的博士候选人而言，发表论文变得更为重要（虽然发表论文并不是毕业的必要条件）。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不能超过8年的期限，这也要求青年学子具备紧迫感，努力进取。